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琨,顾美佳.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的具体表征和弥合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7(5):102-106.

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的具体表征和弥合路径

李琨 顾美佳

(武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正义是人类构建美好社会的要求,城市治理正义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当前全球城市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空间非正义问题,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具体表现在资源分配的异质化、主体平等性的缺失以及城市文化景观的同质化等方面。因此,应坚持人民性、公平性、人文性的价值导向,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协调区域空间资源均衡,尊重城市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关键词:空间正义;正义缺失;城市治理

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4)05-0102-05

正义代表着公平、公正、合理,它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空间正义则是社会空间秉承正义价值理念,使空间生产在正义原则下运行。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提出“空间正义”的概念,但是在其著作里有“空间”概念或暗含“空间正义”的相关表达,这在一定意义上为后来学者对“空间”及“空间正义”的深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城乡对立问题表述了空间隔离与分化的社会性内涵,揭露出这些现象背后隐含的非正义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就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1](P532)}在从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造成了一系列空间非正义现象。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也指出,“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2](P276)}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空间正义”的表述是在

对西方资本空间扩张和重组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的批判下产生的。

空间正义理论是在西方国家的城市现代化危机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空间维度下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其对于我国城市空间问题的很多相关议题同样具有解释力。我们只有立足唯物史观,站稳阶级立场,才能辩证、客观地提出满足中国国情的正义理论。国内城市治理的空间正义理念,并非简单机械地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对当代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种种空间非正义现象的审慎反思。^[3]笔者将利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方法,根据中西方城市治理中空间正义缺失的具体表征,分别找出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内在逻辑,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我国城市空间正义缺失的对策。

一、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的具体表征

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与西方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城市多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上,早期主要是政治或军事中心,而工商业基本为统治阶级服务,随着历史演变,商品经济逐渐活跃,城市的经济功能逐渐

收稿日期:2024-04-30

基金项目:湖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全媒体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时代性研究”(22ZD049)

第一作者简介:李琨(1980—),女,甘肃兰州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通信作者:顾美佳(2001—),女,河南信阳人,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E-mail:2958451725@qq.com。

凸显,但政治涵义仍旧深厚。相较之下,西方城市则更多建立在商业文明基础之上,城市的经济意义远大于政治和军事意义。这种历史背景与发展轨迹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城市在空间非正义问题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持续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且城市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及人口密度又使中国的城市发展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的非正义现象更多地体现在城市空间侵占导致的隔离化、空间剥夺下的对抗化等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具体表现,对城市居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而在中国,城市空间非正义更多地体现在资源分配不均、主体平等性缺失、文化景观的同质性等方面。

(一)资源分配的异质化

空间非正义主要来源于地域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权结构,其主要关注点是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空间的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空间分化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区分如果不能大张旗鼓实施,那么就在伪善的谎言下进行。”^{[4](P326)}在空间正义视域下,空间资源异质化表现为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挑战,是空间资源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导致空间利益分配不公,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一,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城市空间是有限的,资源同样也是有限的。资源的分配在地域之间呈现出非均衡的特点。首先,产业结构的异质化。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高,而另一些地区主要靠传统产业维持,产业结构单一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等,由于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分配的资源也较为优质,这就促使中心城市的工业、服务业发展迅速,高新技术产业如新能源与节能、电子信息遥遥领先,产业链的丰富程度也优于其他地区。据《2023 年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分别为 1.9%、6.0%,^[5]在当地生产总值中占比较大,对比其他城市的产业生产总值,优势极为明显。其次,科技和人才资源的异质化。大城市如上海、广州、杭州等通常拥有数量较多、层次较高的科研场所和高等院校,能够培育出更多高科技人才,拥有大量的科技产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

当地高校源源不断输送高层次知识分子,其发展速度和质量自然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发展定位不同,劳动力不断向外流出,而科技人才数量对于当地的发展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第二,不同群体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乡村空间逐渐被城市和郊区覆盖,村民生活空间急剧缩小,一部分群体被迫迁往城市蜗居,另一部分群体则留在乡村。他们原有的空间权利随着空间的缩小也被边缘化,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均等的教育、医疗等服务,这加剧了城乡的二元化。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3》显示,各省市小学专任教师以及在校生数量皆由城区向乡村逐层递减,教育资源严重倾斜。^[6]这种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可能会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主体平等性的缺失

空间正义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相对公平地享有空间权利的一种理想状态,而在非正义状态下,不同主体之间会出现失衡现象,造成一系列不平等问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然而在实际发展中,城市治理出现了一系列非正义现象,社会主体的差距扩大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方面,还体现在政治生活当中。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在当前城市治理中出现了主体不平等的现象,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问题并不是痼疾。在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平等性的缺失一般会导致以下方面的问题。第一,降低消费增长预期。当大量社会成员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时,他们对当前的生活感到不公,在无力改变当下的状况时,只能通过降低自己的消费需求来维持现状。他们无法充分参与经济活动或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降低了消费增长预期,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潜力。第二,降低城市生态质量。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的用地功能不同,地段优越的位置会被过度开发,附近居民的生活水平会逐渐上升。但是,区域被开发后若未得到及时的恢复,将会导致该区域的绿地减少,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频发,对居民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在郊区生活的居民,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生活区域的环境质量相比城市中心更高。这样的差异会对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城市文化景观的同质化

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7](P121)}城市文明的基本形态由每个时代留

下的街道、民居等构成。城市文化景观的同质化是指在空间规划和发展过程中,忽视地方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对外来文化、个性文化缺乏包容,使得空间文化趋于一致,失去了原有的独特性。时代积淀的文化气息在城市化进程中消失殆尽,进而表现为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忽视。这是城市治理进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城市建筑和景观的同质化。在城市现代化浪潮的袭击下,各地政府为提高当地经济效益,引进高技术人才,对城市空间进行整合重构,对城市进行开发和改造升级。别具一格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繁华商业街区、高级写字楼,诸多历史名迹在城市发展中消失。大量相同的建筑风格和规划模式,使得城市失去了个性和特色,千城一面。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批网红城市,瞬时便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力。然而,如出一辙的装修风格、毫无特色的产品很快就让大众产生审美疲劳。大众只能获得景观层面的视觉刺激,完全感觉不到古迹、文化、民俗的真正魅力,城市的文化底蕴、传承精神以及本土特色逐渐湮灭。正如马克思所讲,“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4](P34)}

第二,城市多元性文化的缺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和多元性,也正是这些特点,造就了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尽管多元化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碍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人的生活方式也趋于同质化而渐渐失去了多样性。久而久之,空间和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逐渐弱化,这削弱了居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空间同质化以及多元性文化缺失使得城市居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最后,城市空间沦为一个“物的牢笼”。^[8]

二、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的内在逻辑

空间正义强调对在城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进行反思。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空间问题广泛存在于公平正义、资本积累、生活实践构成的体系之中,空间产品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关系,使得不同空间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权力进行争夺。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在资本积累逻辑的支配下,城市空间往往以加速资本循环和实现资本积累为目的,这就会导致空间非正义现象,如空间侵占与剥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级严重固化等。因此,

西方城市空间中的非正义现象源于资本的私有性和无限增殖性,这导致生产与分配被非正义的方式所操控。相对于西方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逻辑,我国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更注重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其中造成利益差别的根本原因都是围绕着人民这个中心。

(一)权力逻辑

空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权力运行的重要载体。^[9]在现代社会中,空间与权力的对抗表现为空间的权力化。列斐伏尔指出,“空间乃权力、知识等话语转化成实际权力关系的关键,在我看来,也就是剥削和统治的关系,是通过整个空间并在整个空间中,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得到维持。”^{[10](P43~62)}权力主导者通过空间资源配置、空间的权力化对城市进行超范围运用,使得部分人群处于正义缺失的状态。首先,空间资源配置的权力化。政治性的办公选址地通常都是城市中心聚集地,城市中心因政治而集聚。在政治、经济的双重影响下,更多的优质资源被吸引而来,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撑。权力的集中吸引资源的集中,然而过度的资源集聚效应反刍,产生了空间非正义现象。其次,空间的权力化使得某些社会群体的权利受到损害。一些地区可能因为权力的干预而无法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资源投入,导致相对贫困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甚至可能出现社会排斥和歧视现象。城市开发过度集中在部分地区,其他地区则被忽视,或被剥夺发展机会,这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均衡和城市功能的单一化。

(二)资本逻辑

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需求的无限性一直以来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顽疾。在西方城市治理过程中,空间既得利益者将城市作为获取利益的权力工具,破坏边缘性群体的正当需求,空间非正义现象由此产生。而中国的城市治理并不是要走西方的老路,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逻辑发展思路。资本逻辑不是简单地套用资本主义,而是对当前我国城市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矛盾的简单归因和概括。首先,城市空间的私有化。马克思曾经从地租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化对土地开发、空间建造乃至房屋建筑的变态复制:“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11](P640)}在土地开发过程中,权力的主导者通过出售土地的开发权从而完成工作考核要求,无良企业家在此过程中通过特殊途径竞得价格低廉的土地,经过开发

和运作再以高价售卖给市民,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行为对社会公民的影响是沉重的,不同消费能力的人群被资本分置在不同空间,“空间隔离背后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尊卑关系,书写着等级与身份的差别”^[12]。其次,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在资源有限的国土空间中,公共空间对于居民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追求土地效益的最大化,资本介入,占领、开发本应属于居民的公共空间领域,这些空间被开发为商超、住宅区等具有资本性的建筑。无底线扩张的资本成为破坏公共空间的异己力量,使得城市治理的正义性逐渐萎靡。

(三)情感逻辑

城市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它和人类之间的联系是城市治理的主要内容。对于城市居民而言,现代性的经济化和理智化空间价值观的主导使得当代城市空间缺乏生命力和人文性。城市规划建设的飞速发展,使得建筑景观和空间交往日益呈现出机械化和商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让城市变得千篇一律,显现出同质化、单一化等非正义的特性。为了打造均质性的现代社会,当代城市空间加快了各种要素的空间流转,这一过程导致其对人类文化情感多样性和空间认同感的削弱。首先,城市空间的流动性使其失去了人文性特征,同时使得城市生活呈现出冷漠、疏远的特点。理智化的空间斩断了城市与人类主体的情感联系,城市空间越来越显现出机械性、功能性特征,人工化的景观和建筑相似而陌生,越来越远离人类文化情感,使得城市居民对城市环境无法获得最直观的感性体验。其次,居民对城市的情感寄托包含着群体的认同以及归属感的获得,居民和居民生活的城市的感性距离越来越远。城市居民与其所生存的空间缺少一种直观且具体的文化情感统一性,久而久之,居民与城市的情感联系逐渐淡化,他们对自己长期生存的空间无法产生情感。情感在某种层面上具有时间性,它的浓度会影响文化价值的深厚性,而上述的情感漠视现象则会使得城市文化短暂易逝,不能形成内在的文化价值核心,进而难以形成地方特色文化。

三、我国城市治理正义缺失的弥合路径

空间正义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种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3](P161)}城市治理如果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违背了人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就会对城市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

实现城市治理正义,应将人民性、公平性和人文性作为实现城市治理空间正义的价值诉求,寻求城市治理过程中空间非正义问题的解决之道。

(一)人民性: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是人民,城市空间是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空间,城市治理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正践行了正义原则。“发展的好处应当惠及所有的社会,惠及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4](P63)}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首先,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城市治理应注重社会融合与和谐发展,促进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全覆盖,保证全体公民共享城市现代化成果。要重点抓好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要完善城市公共教育服务,不断吸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近入学,解决城市建设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要满足城乡居民的住房需求,不断改善外来务工人员 and 住房困难群体的住房条件,做好兜底保障,实现居住空间的均等化。要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创新医疗体制机制,在不同地域空间建立不同层级的医疗服务体系,特别是要确保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医疗服务。其次,鼓励人民协同参与城市治理。治理需要权威,更需要合作和协同。在城市治理中,要确保城市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与公开度,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意识。近年来,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东城社区坚持以社区为平台,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东城社区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加强社会救助管理,开展老幼关爱服务,探索出“1234”工作模式,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有序的政治参与,满足城市空间生产的基本政治需求,进而实现空间正义。凭借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加快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居民协同治理城市的友好局面,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和参与度,实现城市治理正义。

(二)公平性:协调区域空间资源均衡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城镇化遵循经济和技术的理性准则,是一种服务于少数人、特殊利益阶层的城市本质观,其城市化进程始终以资产阶级逐利的核心价值为旨归,^[15]这与我们的价值观相抵牾。马克思认为:“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

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6](P444)]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推崇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公民,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解决城市治理过程中的资源异质化问题,就要确保当前空间利益均衡,保障人的空间权益不因人的身份而有差异。在城市治理中实现公共资源平等分配,应将空间权益均等化作为践行正义原则的前提。这就需要从公共资源配置理念上彻底改变城市优先的思维。在教育资源方面,不仅要保证基础性教育能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普及,也要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向乡镇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平稳健康发展;在科技和人才资源方面,应分地区进行精准引进,同步合理配置科技人才岗位,协调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一方面,政府应根据各地产业经济发展的需求,高效开展技术人员的引进,避免造成人才资源的过度浪费。同时,鼓励不同地区的人才和科技资源相互流动,政府和企业可以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多样性的交流平台,加强合作交流,提高创新能力,进而形成人才资源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国家应持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对当地的产业结构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升级,提高生产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引导劳动力在区域之间流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除个别超大城市外,持续放宽落户政策,让有意愿在城市定居的人才顺利定居,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城市治理正义。

(三)人文性:尊重城市文化景观的多样性

人文性通常是指与人类文化、历史、道德等相关的特质或属性,它强调的是人的情感和思想。解决空间正义缺失问题,主要是从人本身着手,通过平衡文化权利来改善处于非正义状态的群体,建设情感寄托体,增强群体的获得感。一方面,建设多样且富含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趋利性驱使其侵占有利的公共空间、资源,从而获得资本积累,使得其他群体只能居住在城市外围地带。因此,当地政府需要为边缘化的群体建设开放性的空间,并打造具有本土色彩的商业街区,保留城市文化特色,挖掘文化资源,让城市居民能够在真正意义上拥有归属感和获得感,满足广大居民对多元文化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保护城市文化的独特

性。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城市现代化使得历史文化区域逐渐消亡,因此需要保护具有本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文化空间,在合理保护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化资源开发和建设,弘扬和挖掘特色资源,以推进特色城市建设,改变城市文化的同质化趋势。再则,尊重和包容文化的多样性,根据不同群体的差异化情感,建设具有集体性的情感生活空间,并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和福利待遇;加强民族文化、城市文化、社区文化等的感情维护,促进城市现代化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不断消解各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和冲突,释放文化多样性。总之,构建具有正义原则的城市空间,不仅要考虑城市文化自身以及城市建筑的同质化趋势,建构富有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空间,也要尊重不同群体在文化和价值上的差异性,建设公共文化空间,增强城市居民的文化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实现城市治理正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曹莉莉,林滨.空间正义视域下我国城市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指引[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上海市统计局.2023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23.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3[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3.
[7]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8]王莹.空间正义视阈下我国城市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解决路径[J].理论与现代化,2018(5).
[9]袁超,李建华.论空间权力化[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6).
[10](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M].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2]任政.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6).
[1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14](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钰,温平,李继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5]谢欣然.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视域下的中国话语及其实践路径[J].学术研究,2024(4).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